

## ■ 国宝纪事

潍坊人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收藏者。在陈家密藏几十载后，毛公鼎开始了颠沛流离之旅。

如今，陈介祺的后人历尽艰苦，成功复原出毛公鼎，令宝鼎风采再现故乡。

# 毛公鼎：颠沛半世纪，故乡现风采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 
本报通讯员 王伟利

在潍坊潍城区陈介祺故居万印楼内，保存着一个“鼎”的复制品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件复制品还原的是目前所见古鼎中铸刻金文最多的“毛公鼎”。

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收藏者，也是鼎文拓写和解释的第一人。在他故去后，毛公鼎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流浪之旅，最终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上世纪末，后人陈祖光有感万印楼不复毛公鼎身影，来往两岸数次，精心研究，终于成功复制出毛公鼎，了却心中的夙愿。

9月初，第二届陈介祺艺术节在潍坊潍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开幕。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再度将目光聚焦在毛公鼎之上。

## 鼎赐重臣，千年现身

所谓毛公鼎，又叫毛盾鼎，因制作该器者名叫毛公盾而得名。在金石学界，毛公鼎的名号如雷贯耳。

毛公鼎意义之重要，在于其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，内有铭文32行，合重文497个字。

根据后世学者研究诠释，毛公鼎铭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：第一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盛况，同时实事求是地道明当时西周政局不稳；第二部分宣扬周天子对毛公的册命；第三部分介绍周天子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特权；第四部分讲周天子告诫并勉励毛公以善从政；第五部分讲周天子赏赐毛公马车、兵、命服等物，毛公表示感谢并称颂天子美德，作册以纪念。其中，除第一部分以“王若曰”起首外，其余四部分均以“王曰”开头。铭文叙事详略得当，内容丰富，史料价值极高，郭沫若称之为“抵得上上一篇《尚书》”。近代学者李瑞清题跋该鼎时也说：“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，其文则《尚书》也，学书不学毛公鼎，犹儒生不读《尚书》也。”《尚书》乃儒家“五经”之一，是儒者必须仔细研读的经典文本。毛公鼎犹如《尚书》，足见其重要性。

不知何时，毛公鼎埋入深土，湮没无闻。两千多年后，毛公鼎重现世间，旋即引发关注。但毛公鼎并非考古挖掘出土，而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所得。

据《陕西金石志》记载：“是鼎咸丰八年（公元1858年）出土，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，运省各熔化，为苏亿年瞥见。他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，运京出售，稀世之宝，乃得流传。”但另一种更有影响的说法，是认为毛公鼎在道光末年出土。两说究竟孰是孰非，至今难有定论。

据后一种说法，道光年间，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耕种，无意中锄头碰到一件硬物。他找来几位要好村民，齐心协力将这块硬物掘出。看到土锈斑斑的古鼎，董春生有些傻眼：他只知道这是一件古物，但究竟价值如何却不得而知。

当地古董商闻讯赶来察看，发现该鼎内有密密麻麻古文字，即知此鼎价值不菲。他花三百两白银从董春生手中收购该鼎。

沉甸甸的雪花白银，晃得董春生睁不开眼。乡间耕耘半生的农民，哪见过这么大的一笔财富，当即领首同意。古鼎成了宝鼎，还卖了三百两，这在村庄激起轩然大波。当古鼎运至村南时，村民董治官以宝鼎归全村所有为由，聚众前来抢夺。

即将到手的肥鸭子飞了，古董商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行贿岐山县令，以“私藏宝鼎”罪派人抓捕董治官。在被吊拷关押月余后，董治官交代了古鼎密藏之处。县令即派衙役从董治官家偏僻处起获毛公鼎，并运到县衙存放。古董商随即从县令手中运走了宝鼎。

到了咸丰二年，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大商人苏亿年之手。苏亿年颇有识宝鉴宝的眼光，他看出此鼎价值连城，便要售卖个好价钱。

西北无人识货，金石买主当在京城。因为

2018年10月1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电话:(0531)85193021 Email:wsfxqrlw@163.com



毛公鼎及其拓片

苏亿年坚信宝鼎“奇货可居”，始终索要高价，西北地区无人购买。他索性举鼎入京，奔走于士大夫之门。

当时的人文士大夫大多有搜罗碑拓、金石之雅好。当时在京城翰林院供职的陈介祺，刚刚为其父协办大学士陈官俊守丧结束，心中苦闷难遣，遂极好金石之物。

陈介祺《毛公鼎释文》有“咸丰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宝董居士陈介祺奉册并记”之语。即该年农历五月十一，他手写毛公鼎释文，“审释并记”，可知陈氏得鼎当在该年。

## 拓片考释，秘不示人

陈介祺得毛公鼎后，很快就对鼎内文字产生浓厚兴趣。他请人拓好鼎内金文十余份，除用于自己考释外，分别寄给同好金石的好友吴式芬、徐同柏、许瀚三人，请他们也加以研究。

陈介祺学问渊深，精通古文，他在《毛公鼎释文》中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，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。在秘密研究的情况下，他的释文已把铭文中大多数字释出，而对于一些难度高的字则暂时阙疑。

获得毛公鼎拓片的徐同柏和许瀚，也开始了对鼎内文字的研究。徐同柏依据铭文拓片通篇写出释文，并尝试对铭文中疑难字进行解释，他还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。徐氏的释文收录在《从古堂款识学》中。

日照人许瀚是当时的著名文字学家，研究古文字是其专长。他的研究成果收录在《攀古小庐古器款识》中。

后来，陈介祺参考徐同柏和许瀚释文后，五易其稿，于1871年写成《周毛公鼎考释》。

陈介祺在研究毛公鼎文字的同时，也对毛公鼎进行著录。他将第一篇毛公鼎释文装裱成条幅，上为“四虢形”铭文拓片，中为释文与后记，下为器形，一足在前，两足在后。

陈介祺的学术研究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，而毛公鼎更被他当作无上秘宝，绝对不公开示人。因而民间很少有人知道毛公鼎在他手中。

陈介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？有人认为这和清朝的法律制度有关。当时清朝法律不允许私藏秦汉以上文物，故陈氏谨慎暗藏。

但清代收藏青铜器谱录《西清古鉴》序言载有乾隆帝诏书，有言曰：“我朝家法，不事玩好，民间鉴赏，既弗之禁，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，未尝不富。”可知当时清律并未禁止民间私藏文物。

陈介祺如此谨慎，恐怕还是和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。

当时清廷官场黑暗，官员之间尔虞我诈已是司空见惯。陈介祺父亲虽然身居显位，也常遭到无妄之灾。在父亲故去后，陈介祺失去政治依靠，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他在翰林院做编修时，“性端严，持身公谨，博雅好古”。为了远离是非难辨的官场，陈介祺转而将大部分精力和财力放在了搜集古物上。依靠

殷实家境和出色眼光，陈介祺收藏陶器、古印、铜器颇多，被誉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。但盛名在外，“树大招风”，陈介祺的宝库也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。如今得此重宝，更不能四处张扬，以免引火烧身。

很快，一起事件就验证了陈介祺的顾虑。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风起云涌，席卷清廷半壁江山。清廷本就财政奇绌，此时一面失去江南赋税重地，一面军费开支激增，财政状况更是濒于破产。户部银库空空如也，连京城官员的新俸都无法支付。

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御史文瑞上疏建议让富绅解囊捐助。他还开出了十八家富绅名单，其中陈家就在其内。不久，户部尚书孙瑞珍也联合几位官员上疏，请求皇帝命令京城官员捐款，共同度过这段艰苦岁月。

咸丰帝令僧格林沁主持华北防务，并负责催逼山东籍官员缴纳捐款。按照相关规定，“寒素”官员最少交纳几千两，“殷富”官员则要交出一万两。济宁籍官员孙毓汶看不惯这种“威逼”手法，联合山东数位官员拒绝交纳捐款。僧格林沁决定杀一儆百，一道弹劾奏折不仅将孙氏革职，甚至将他遣戍新疆。《清史稿》解释其中关键，在于“恭亲王以毓汶受国恩，首抗捐输，深恶之”。翁同龢的日记中，也记录了孙毓汶遭受的屈辱：“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，请革职枷示，发新疆。奉旨免其枷号，即革职发新疆。”他为孙毓汶抱不平，“词居乡，乃被斯议，亦奇哉”。

孙毓汶反抗的下场让山东籍官员胆战心惊。陈介祺本来请捐一万两，僧格林沁因其是收藏大家而不同意，最终陈氏被迫以四万两交差。为了凑齐这笔巨款，陈介祺相继变卖了北京和潍县老家的店铺，足足奔波一月才拼凑出这笔捐款。他虽因积极出资而被咸丰帝记功，并赏戴双眼花翎，但却失去了收集古物的一大笔资金。陈介祺由此自认“热闹场中良友少，巧机关内祸根蟠”，最终辞官归乡。

返乡之后，陈介祺为安置这些古物，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“万印楼”一幢。楼内藏有商周铜器248件、秦汉铜器97件、石刻119件、砖326件、瓦当923件、铜镜200件、玺印7000余方、封泥548方、陶文5000片、泉镜铍各式范1000件。因集有三代及秦汉玺印7000余方，遂名其楼曰“万印楼”。

## 时势蝶变，宝鼎遭难

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安静了三十余年。光绪十年（公元1884年），陈介祺病故于家。他遗留的古物器具被分成三份，其中毛公鼎分给了次子陈厚滋，后来又辗转到了陈介祺的孙子手里。

此时的陈家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大的建树，子弟却染上了纨绔享乐的习气。眼见家财日益枯竭，子弟们动了售卖古物的心思。

稀世之宝毛公鼎销售的消息震撼了金石学界，也引起了金石学家、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。他酷爱金石收藏，自己收藏的青铜器、玺

印、碑刻拓本极为丰富。他甚至还在出洋考察中，收集古埃及文物。端方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柶禁，该青铜柶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，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柶禁所附列的缶、觚、爵、角、尊等12件青铜酒器，是一整套配套的商朝青铜器。端方凭借显赫权势，派人来到陈家，半威逼半利诱，限其三日交鼎。最终，在端方软硬兼施下，毛公鼎以两万两白银成交。端方得到毛公鼎后，极为深爱，时常赏玩。他与陈介祺一样，请人制作了几十张拓片，或高价出售或赠送友人。他还亲自将其中最精美的拓片送给好友袁世凯，可见两人私交之深、关系之密。

宣统三年（公元1911年），四川“保路运动”爆发，一时间势如星火，燎原蜀地。清廷无计可施，只能起用此前被迫赋闲的端方。清廷授其三品侍郎銜暨铁路大臣，全权督办川汉、粤汉铁路一切事宜。

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之际，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，令端方暂时署理。他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一部，经宜昌入川，至资州一带。不久新军发生哗变，端方连同弟弟端锦为新军士兵所杀。

端方兄弟去世后，其京城房产也被人纵火烧毁，遗属为维持生计，被迫变卖他生前藏品。端方生前曾在1905年为清末立宪出洋考察，又担任过负责东南洋务外交的南洋大臣，因而结识了很多欧、美、日多国的社会人士。端方死后，觊觎其藏品的生前好友纷纷而至。其中美国学者福开森以端方生前挚友身份作掩护，诱骗端方之子以二十万两白银将整套商朝青铜器卖给他。

端方遗孀则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。当时古玩界有些人也想低价购入，到处造谣惑众，声称该鼎其实只是陈介祺仿造的赝品而已。谣言炽盛之际，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，派出专人去潍县陈氏后人府上，借调陈介祺当年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，发现仿器不仅重量有差异，造型与铸工也很粗劣，最终断定所收质押之物绝对是真品。经过这场风波，毛公鼎名声大噪，身价倍增。

不久，由福开森做媒，找到端方遗孀，表示英国记者辛浦森愿意出价五万美元，但因遗孀嫌价太低而没有成交。洋人觊觎，志士护宝。毛公鼎质押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，令国内一些爱好古玩的人士忧心忡忡：国宝随时都有流向海外的可能。1926年，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，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，代端家到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，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。端家掌门人表示同意后，谈荔孙立刻前往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转账手续，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。

## 洋人觊觎，志士护宝

毛公鼎质押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，令国内一些爱好古玩的人士忧心忡忡：国宝随时都有流向海外的可能。

1926年，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，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，代端家到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，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。端家掌门人表示同意后，谈荔孙立刻前往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转账手续，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。

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，又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叶恭綽，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，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回。

热爱收藏的叶恭綽闻听此言，当即明白福开森想据毛公鼎为已有的真正用意。为了打破洋人对毛公鼎的窥伺，叶恭綽联系了暨南学堂（现暨南大学）首任校长郑洪年、光绪年间进士冯恕，商议定计保住毛公鼎。叶恭綽在宣统元年由邮传部派赴欧洲游学，并考察铁路建设事宜。旅欧期间，他与端方六弟端锦同习铁路专业，交往频繁，交谊深笃。宣统三年，端方任铁路大臣后，当即起用叶恭綽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。

郑洪年不仅与叶恭綽为广东番禺同乡，和端方也有一段交往。1906年，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办暨南学堂，令郑洪年出任首任校长。冯恕曾随载涛赴英、美、法等八国考察，看到欧美列强因立宪而富强，对端方积极立宪的主张衷心赞同拥护。

三人或怀知遇之恩，或存念旧之情，对保护国宝非常热心。三人决定各自出资，合股买进毛公鼎。他们还约定，毛公鼎购得后仍存放



十笏园文化街陈介祺艺术节开幕 鲍青 摄

于北平大陆银行。

到1930年，郑洪年、冯恕两人向叶恭綽出让了手中持有的毛公鼎股份。从此，毛公鼎所有权归叶恭綽独自拥有，但仍继续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。

四年后，叶恭綽迁居到上海筹建“上海市博物馆”。次年“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”成立，叶恭綽出任董事长。毛公鼎也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并运至上海保存。

1937年，中日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陷入一片火海。叶恭綽眼见上海即将不保，决定暂时去香港避难。离沪前他将自己珍藏的7箱文物，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，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鼎。

1940年，叶恭綽姨太太潘氏为侵吞他的财产，到法院大肆诬告叶恭綽。叶叶闻讯，急电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侄子叶超再次自己去上海应诉。在香港叶恭綽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：“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，日后不得把它变卖，不得典押，决不能流失出国！有朝一日，可以献给国家。”

叶公超到上海后，去汪伪法院作为被告应诉。不料潘氏为求得胜诉，竟向日本宪兵队密报毛公鼎藏匿上海的消息。日本宪兵队得悉此情报，立刻上叶家搜查，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，叶公超因此被捕。他经历了三次审讯，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，也未吐露毛公鼎的密藏之处。

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，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赝品毛公鼎交出。1941年，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，完好无损地奉还于叶恭綽。

不久，香港也被日寇侵占，叶恭綽于1942年10月逃回上海，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。叶恭綽在上海坚拒出任伪职，闭门谢客。不久他身染重病，家庭经济又发生危机，只得将毛公鼎质押银行。后来上海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。

## 尘埃落定，故乡再现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陈永仁将毛公鼎交给“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”。上海市聘叶恭綽为“毛公鼎保管委员会”委员。1946年5月，毛公鼎被军统局保管处领回，从上海运至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。

同年10月，为期一个月的“文物还都展览”开幕，毛公鼎属于其中的重器展品。展览结束后，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中央博物院收藏。

1948年，毛公鼎被清点后小心翼翼地打包装箱，从南京中央博物院迁往台湾基隆，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“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”保管。

1965年，毛公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，至今陈放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中。

2003年，陈氏后人陈祖光前往台湾考察。在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时，他惊喜地发现先人收藏的毛公鼎真品竟然藏身于此。

陈祖光原本就怀有重铸毛公鼎的心愿，如今亲眼宝鼎更是心潮澎湃。由于博物院不允许拍照，陈祖光又五次飞赴台湾，凭着手绘和记忆来记录毛公鼎细节。第五次时，他带领铸造工艺师一起前往，让工艺师亲眼看看文物 samples。

2008年，在众多专家指导下，本着尊重历史、复原历史的原则，陈祖光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制鼎过程。

历时两年多时间，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毛公鼎仿制品终于完成。陈祖光特意捐赠给陈介祺故居万印楼一件，了却了心中夙愿。

今日，我们也可以在万印楼目睹“毛公鼎”的风采。

## ·相关链接·

1924年5月，北京的《晨报》以《清室又拍卖古物》为题，披露了清室疏通权贵倒卖古物的行径。文末最后点评道：“辛亥革命后，末代皇帝溥仪仍旧过着虽无实权却称孤道寡的日子。为了维持奢华糜烂的生活，总是想尽办法盗运典卖内廷的珍宝文物，好不令人痛惜。”

# 乱世：文物收藏的克星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陈介祺钟爱金石，为收藏毛公鼎历尽艰辛。但在其故后，随着乱世来临，这些生前珍宝却随之散落他地。

乱世似乎是文物收藏的天敌、克星。清帝逊位之后，大量的皇室珍宝也流落民间。

根据达成的“优待皇室”条件规定，清帝退位后暂居后官，内务府也允许保留。皇室每年的开支惊人，民国提供的优待费无法满足需要。此外，溥仪为了政治利益还进行大量的赈灾行动，使开支更加浩大。

当时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。溥仪想拿出一笔款项，但因为现款筹集困难，便送去了估价美金三十万物的古玩字画珍宝。1930年陕西受灾，溥仪又捐出百余件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皇帝所遗珍宝。

民国政府每年拨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皇室经费，但小朝廷依旧是财政紧张。为了维持皇室尊严和满足享乐，皇室将目光盯上了官廷中的珍宝古玩。

早在民国初年，皇室成员和内务府官员为满足私欲，就开始窃取官廷文物，受到社会舆论谴责。溥仪大婚前夕，小朝廷财政难以为继，众人目光再次盯上官廷文物。

迫于舆论压力，内务府采取将官廷文物以“盗卖”“拍买”改为“代售”“抵押”方式套现，以获取资金周转。溥仪大婚前的中秋节，在皇室授意下由汇丰银行借款五十万元。虽然民国政府加强了对小朝廷文物监管，但这批金器还是被顺利运至汇丰银行。

溥仪大婚以后，皇室为还清欠款以及处理到期抵押合同，经内务府大臣与大陆银行协商，分

两批次借款八十万元。该事件一经曝光，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

1924年5月，北京的《晨报》以《清室又拍卖古物》为题，披露了清室疏通权贵倒卖古物的行径。文末最后点评道：“辛亥革命后，末代皇帝溥仪仍旧过着虽无实权却称孤道寡的日子。为了维持奢华糜烂的生活，总是想尽办法盗运典卖内廷的珍宝文物，好不令人痛惜。”

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故宫文物应当归国家所有，皇室不能随意倒卖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会还发布公函，强烈要求民国政府收回故宫文物，并加以严格保管：“据理而严，故宫所有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。国体变更以来，早应由民国收回，公开陈列，绝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……为此函请将此事递交国务会议，派员清查，务须将倒卖主名者向法院提起公诉科以应得之罪。”

由于受到社会舆论压力，民国政府问询，小朝廷被迫偷偷将抵押物品赎回。但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理文物时，再次发现抵押合同，紧接着报纸又曝光小朝廷为偿还债务，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八十万银元一事。抵押品中不但有册封皇太后、皇后的金册、金宝箱、金宝塔，还有在溥仪大婚上奏乐的金编钟。

盐业银行在收到善后委员会函件后并未理会。1927年，盐业银行计划出售内务府抵押在该行的金器、瓷器等古物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善后委员会为了古物安全，立即致函内务部希望查清事实并严禁官廷文物售卖。内务部在收到善后委员会函件后，立即进行了查找，并最终确定了这批官廷文物的储藏位置并未在盐业银行库房。据盐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批文物已由内务府委托

赎回。

其实这批物品内务府并未赎回。盐业银行已秘密出售部分陶瓷、古玩等，用来填补账目亏空。另外一部分金器如金编钟等，盐业银行并没有登记在账目内，而是偷偷转移到东交民巷。

随着抗日战争来临，故宫文物南迁避敌，北平岌岌可危。盐业银行决定把金编钟和两千余件瓷器、玉器秘密运往天津，避免了战火的荼毒。

清末民初，除了小朝廷出售导致文物流失外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文物收藏家窥伺中国文物。内务府在抵押官廷文物后，由于无力回赎只能任银行自行处理，致使大量珍贵玉器、瓷器以低价卖给这些私人收藏家，而流失国外。

英国文物收藏家大维德，得知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抵押的清室珍宝后，不顾其他觊觎这批文物收藏家的威胁，几番周折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，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官旧藏的精品。清官旧藏中，乾隆御题藏品有199件，而大维德收藏的就有20件左右，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官旧藏。

1930年，这批藏品通过日本、美国辗转回伦敦。1946年，大维德将自己收藏的140余件瓷器等珍品，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。1950年伦敦大学在伦敦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，取名“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”。这批官廷文物也就永远存在了异国他乡。更为可惜的是，一些做工精美的金器流落到商人手中，竟被熔化销毁，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